

苏轼及其时代

■ 杨东声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苏轼及其时代

杨东声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轼及其时代/杨东声.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601-7626-0

I. 苏… II. ①杨… III. ①苏轼(1036~1101)—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368 号

书 名: 苏轼及其时代

作 者: 杨东声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孟亚黎 仲怀民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375 字数: 130 千字

ISBN 978-7-5601-7626-0

封面设计: 李华三

吉林省吉财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像苏轼一样在文学上有那么宏伟的成就，诗词散文样样精娴。特别难得的是他在政治上有极其崇高的声誉，备受百姓的爱戴；在门生中也非常受到推崇，去世后受到几乎如神一般的敬拜。宋孝宗对他赞不绝口：“忠言谏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朕万机余暇，细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① 宋史对他的评价也是无以复加：“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② 从这些角度来看，苏轼应该算是中国文人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了。

中国现代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因受当时“左”的政策误导，苏轼的声誉连带受到打击。自“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苏轼的声誉因此再度恢复。十几年前朱靖华不但把苏轼推尊为中国的顶尖人物，也把他褒扬为世上“旷世无双的全能文士”：“苏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③ 三年多以前，黄玉峰也同样说：“苏轼是中国文人

① 《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第一册，首页。

② 脱脱等《宋史·苏轼》（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三十一册，卷338，页10818。

③ 《苏轼新评》（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29。



完美个性和品格的化身。苏轼是人类的骄傲。”^① 赵志伟更进一步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明苏轼所以特别值得国人推崇的地方：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多的是专制、等级、仇恨、奴性。不错，大量充斥的是这些，但是从以苏轼为代表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们的诗文以及所作所为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它的对立面：对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虽然他们也许并不自觉，虽然它的力量是那样微弱。——但“苏轼们”的存在，证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非全是黑夜而没有光明！她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吃人！她也有美好的东西。^②

历史上这些对苏轼的赞辞，笔者认为应是公允之论。

在苏轼的一生中，对他及当代人影响最大的一桩政治事件应该算是新法了。就史实来看，新法对神宗朝及其以后的政治弊多于利，并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在元丰三年即已做到参知政事的章惇，先后在神宗及哲宗朝为相，推行新法甚久，但他对新法也不完全赞同，他在哲宗祖母摄政期间就坦白地承认新法的一些弊害：“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③ 在元朝政府主持之下集体修撰的《宋史》中，所有参与修撰的作者都一致表示除了少数的法则以外，新法对当时的平民的确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元朝消灭南宋与北宋的施政无关，没有理由故意歪曲北宋的政治措施，它对北宋推行新法的评断因此应当客观可信。此外，历史上反对新法的官员，除了偶尔意气用事之外，一般人品都相当正直，他们常常为了坚持原则而鄙弃美官。

① 《说苏轼》（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页7。

② 《说苏轼》（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序言。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页418。

例如旧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司马光，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他因反对新法就是不要，神宗说在大臣中也只有司马光一人能够拒绝那么高的官位：“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①相反的，支持新法的官吏却往往不顾原则，只求高位。例如新党极其重要的领导人物蔡京，在司马光为相的时候，为了逢迎，当旧党很多官员都觉得有困难在五日之内废弃雇役法的时候，他却独却众意，在几天之内就废掉此一新法；而在章惇为相的时候，他又能在几天之内废弃旧法，再用新法：

元祐初，光复差役，惇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讲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光不以为然……蔡京时知开封府，用五日限改畿县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置司讲议，出京为户部尚书兼提举。于是京欲掩盖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惇信之，遂请人额，雇直一从元丰旧法。^②

一个人做事没有原则，为了利禄，朝夕反覆如此，令人不免有叹为观止之感，因此旧党在历史上的证词一般应比新党可靠得多。

欧美学者在讨论新旧党争时，一般支持新党，贬抑旧党。他们的论点颇为怪异，用经济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看法，说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是贫民出身，代表中、下农及小商人阶级。例如耶伯哈（Wolfram Eberhard）就说：“王安石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卷七，页341。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页418。



拥护他的人也都是贫穷人家出身，他迅疾地把他们安插到各个岗位。他们代表小地主和小商人阶级。(Wang An-shih came from a poor family, as did his supporters, for whom he quickly secured posts. They represen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small landholders and the small dealers.)”^① 这种说法与史实抵触，值得商榷。首先，不论王安石是贫贱或者富有的家庭出身，反对新法的或支持新法的人绝对不能以家庭出身作为区分的标准，像他弟弟王安国就反对新法。当神宗问他王安石的新法时：“卿兄秉政，外论谓何？”他就回答说：“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② 另外，王安石的父亲王益身为都官员外郎，^③ 不是贫民。再者，绝大多数新法的支持者都是富人而不是贫民。例如支持王安石的参知政事韩绛(1012—1088)，他的父亲韩亿官至尚书左丞，是殷富之家，并非贫民出身。王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父亲做到光禄卿的高位。^④ 当然，在众多的支持者中，最富有的人还是神宗，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新法是绝对不可能实施的。神宗的儿子哲宗和徽宗也全力支持新法，当徽宗任命祸国殃民的蔡京为相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他支持新法的立场：“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⑤

相对的，反对新法的官员并不一定都是大地主或富商的家庭出身。例如激烈反对新法的吴奎“少时甚贫。”^⑥ 东坡的师友张方平(1007—1091)在别人都还不清楚王安石的为人之前就已经预

① 《中国史(A History of China)》(伯克利[Berkeley]:加州大学[U of California P], 1977), 页217。

② 《宋史·王安国》，第三十册，卷327，页10558。

③ 《宋史·王安石》，第三十册，卷327，页10541。有关员外郎的薪阶，参看第十二册，职官三，卷163，页3860；职官八，卷168，页3990；职官十一，卷171，页4103，4113；职官十二，卷172，页4139。

④ 《宋史·吕惠卿》，第三十九册，卷471，页13706。

⑤ 《宋史·蔡京》，第三十九册，卷472，页13723。

⑥ 《宋史·吴奎》，第三十册，卷316，页10321。



知王安石日后执政所可能带来的祸害，小时候家里也很贫穷：“公年十三，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人，家贫无书。”^① 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不赞同新法，也是贫苦家庭的出身：“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② 反对新法而出身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实在多得不可胜数，本书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③ 王安石所代表的，应该不是像西方那些学者所说的贫贱阶级，而是宋朝皇室的利益；而王安石的支持者等而下之，又多半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就如新党的要员之一邓绾所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④ 新

① 《苏东坡全集·张文定公墓志铭》（北京：中国书店，1986），上册，页637；《宋史·张方平》，第三十册，卷318，页10353。《宋史》张方平的列传主要是根据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而写定的。

② 《宋史·陆佃》，第三十一册，卷343，页10917。

③ 《宋史·韩琦》，第二十九册，卷312，页10227；《宋史·吴充》，第二十九册，卷312，页10239；《宋史·富弼》，第二十九册，卷313，页10256；《宋史·范纯仁》，第二十九册，卷343，页10283，10284，10286；《宋史·吴奎》，第三十册，卷316，页10320；《宋史·赵抃》，第三十册，卷316，页10323；《宋史·唐介》，第三十册，卷316，页10329，10330；《宋史·唐淑问》，第三十册，卷316，页10331；《宋史·唐义问》，第三十册，卷316，页10331；《宋史·冯京》，第三十册，卷317，页10339；《宋史·钱景谌》，第三十册，卷317，页10348；《宋史·钱颉》，第三十册，卷317，页10349；《宋史·刘贡父》，第三十册，卷319，页10387，10388；《宋史·郑獬》，第三十册，卷321，页10419；《宋史·陈襄》，第三十册，卷321，页10420；《宋史·孙洙》，第三十册，卷321，页10422，10423；《宋史·吕海》，第三十册，卷321，页10429；《宋史·钱顗》，第三十册，卷321，页10434；《宋史·吴中复》，第三十册，卷322，页10442；《宋史·滕元发》，第三十一册，卷332，页10675；《宋史·苏颂》，第三十一册，卷340，页10862；《宋史·孙固》，第三十一册，卷341，页10874，10875；《宋史·赵瞻》，第三十一册，卷341，页10879；《宋史·傅尧俞》，第三十一册，卷341，页10884；《宋史·孙觉》，第三十一册，卷344，页10926；《宋史·李常》，第三十一册，卷344，页10930；《宋史·孔文仲》，第三十一册，卷344，页10931；《宋史·孔武仲》，第三十一册，卷344，页10933；《宋史·鲜于子俊》，第三十一册，卷344，页10936；《宋史·张载》，第三十六册，卷427，页12723；《宋史·张戢》，第三十六册，卷427，页12725；《宋史·杨十》，第三十六册，卷428，页12741；《宋史·黄庭坚》，第三十七册，卷444，页13109；《宋史·刘恕》，第三十七册，卷444，页13118，13119；《宋史·俞汝尚》，第三十八册，卷458，页13447；《宋史·宇文之邵》，第三十八册，卷458，页13449。上面引证的例子清楚地显示反对新法的官员并非都是殷富家庭的出身。

④ 《宋史·邓绾》，第三十册，卷329，页10597。

法不能获得正直官员及大多数平民的支持，最后的受害者当然还是整个国家。

有的西方学者不以经济而以革新守旧的观点来说明新旧党的异同，例如罗金思机（Witold Rodzinski）就说：

第一个是保守派，全面反对所有关于政府或政策的改革措施。这个团体代表大多数的官员，他们都是大地主的家庭出身。这一派以很多杰出的学者为首，例如欧阳修及司马光，并包括了所有的理学家。第二个是改革派，主要以王安石为首。它寻求新法及新的途径来解决日形严重的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它的目的是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国家。在这两个团体中，保守派占绝大的优势。他们有传统做他们的后台，同时政府官僚体系无可避免所产生的阻力也对他们有利，潜在地阻挠任何的改革和进步。（The first one was a conservative faction, thoroughly opposed to any changes whatsoever in the forms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policies that had been heretofore pursued. This group represented a majority of the higher officials, who came from the great landowning families. It was led by many outstanding scholars, such as Ou—yang Hsiu and Ssu—ma Kuang, and included in its ranks also all the Neo—Confucian philosophers. The second was a reform group, represented primarily by Wang Anshih himself; it sought new ways and mean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which were being posed by the growing social crisis so as to strengthen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ry. Of these two

groups the conservatives were in much the stronger position; they had all of tradition behind them, as well as the inevitably growing inertia of a bureau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inherently unfavourable to any change or progress.)^①



七



这种说法也不合史实。旧党的官员几乎全都见到宋朝政治的积弊，主张革新；苏轼本身身体力行，从从政开始就立言改革，只是旧党的主张跟新党不同。新党注重皇家的利益，而旧党重视人民的利益。新法对人民造成的戕害，就连断送北宋国运那么腐化的徽宗也很清楚：

帝之初政，锐欲损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为然，已乃陈绍述之说，帝不能决，以问绩。绩曰：“圣意得非欲两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实，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大观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觐，极论茶盐法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对曰：“生财有道，理财有义，用财有法。今国用不足，在陛下明诏有司，推讲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见卿久，今日乃闻佳言。”……蔡京自钱塘召还，过宋见绩，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

苏轼及其时代
SUSHI AND HIS TIME

① 《中国史》，页153—154。此一以阶级为分野的观点在最近的西方作品中仍然不时出现：“私人的仇怨，地域和阶级利益的分歧与对政府不同的看法使得支持和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两派之间仇恨日益升高（“Personal antagonism,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and class interest, and opposing philosophies of government all contributed to the mounting hostility between those for and against Wang's policies”）（《婀贝 [Patricia Ebrey]，《剑桥插图本中国史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剑桥大学 [Cambridge UP, 1999]，页141）。”



矣。”绩笑曰：“人各有志，吾岂以利禄易之哉？”京惭不能对，绩亦终不复用……绩挺挺持正，尤为帝所礼重，而不至大用，时议惜之。^①

徽宗知道新法对人民所造成的戕害，他并不像现代那些学者刻意去粉饰新法的弊端，只是主要因新法可以提高国家的岁入，“以用度不足故也”，所以即使新法对民间不利，他还是继续实施，最后惨遭亡国的噩运。

① 《宋史·徐绩》，第三十二册，卷348，页11025。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宋朝的建立	1
第二章 东坡的家世	5
第三章 早年的教育	9
第四章 应考	14
第五章 凤翔	22
第六章 英宗	29
第七章 王安石的重用	33
第八章 新法	43
第九章 王安石的诬告	67
第十章 通判杭州	70
第十一章 密州知州	75
第十二章 知徐州	81
第十三章 知湖州	84
第十四章 御史台狱	93
第十五章 贬谪黄州	104



第十六章	起复	109
第十七章	党争	112
第十八章	杭州知州	132
第十九章	往返京城	139
第二十章	哲宗亲政	143
第二十一章	二次贬谪	147
第二十二章	晚年	159
结 论		164
参考书目		166





第一章...宋朝的建立

宋朝的建立不是一件人人都引以为荣的事情。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927—976）不像汉朝的刘邦主要靠着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机智取得天下，而是因背叛他年甫七岁的幼主恭帝，才取得了王位。后周世宗（921—959）在去世前，大概为了巩固他幼儿的权位，在人事上突然做了重大的调整。他的女婿张永德，当时任后周（951—959）最精锐的部队殿前军的最高长官都点检，军权在握，周世宗显然不信任他，在病重的时候把他撤换，让赵匡胤取而代之。^① 他这个临终的安排，对巩固他儿子的王位来说，不但无益，反将他儿子送入虎口，赵匡胤因此捡了一个便宜，得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篡夺后周的王位。虽然宋代的史书对赵匡胤背叛恭帝的这件事说得相当暧昧，没直接归罪给赵匡胤，说是因他弟弟赵匡义及其他将领的拥戴，黄袍加身，身不由己以致取得王位，但现代的史家根据史料证明赵匡胤实为政变的主导人：“陈桥兵变，实为赵匡胤所自编、自导、自演的史剧。”^②

这种经由不太光明的途径取得的政权有它严重的局限性。宋太祖在取得帝位之后，恐怕他的手下如法炮制，对他构成威

① 《宋史·太祖一》，第一册，卷1，页3。

② 王明荪《宋辽金元史》（台北：众文图书，1994），页11；参阅方豪《宋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页18—22。



胁，因此要求他的重要将领全部辞职。为了能让撤职的程序顺利进行，赵匡胤以土地、金钱来胁诱他们，要求他们自动让位。在他们交出兵权以后，赵匡胤便亲领禁军，并把全国最精锐的部队集中到京师，让老弱残兵留守地方。这种强干弱枝的政策对他的王位并没产生绝对的保护作用，日后赵匡胤的王位仍然被他弟弟篡夺；更重要的是，地方上的军力从此大为减弱，失去了抵抗外敌侵略的力量，宋朝的灭亡，实跟此一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为了防备军人篡夺政权，赵匡胤除了实施强干弱枝的方略以外，更制定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此一政策之下，赵匡胤一方面提倡文风，鼓励文人仕进，一方面降低军人的地位，将他们隶属于文人之下。更有甚者，军人如同犯人一般多黥面。因为军人的地位大为降低，当时一般有志气的男子都不愿当兵，在中国流行了约千年之久的谚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丁”，^①就是在宋朝开始出现的。为了保持军队一定的数额，宋廷只好征募流民、罪犯之类的人：“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挽，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②罪犯负责保卫良民，这对宋朝的社会来说是一大讽刺。

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到了真宗（968—1022）的一代受到特别的重视，真宗本人亲自写了一首诗来提倡文风：

富家不必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

① 方豪《宋史》，页53。

② 《宋史·兵七》，册14，卷192，页4799。

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①

真宗此诗的结尾说得再清楚不过，一个有志气的男儿不必做别的事，只要读书就可以，而且只须读六经，别的书不值得一提。这种想法在深入一般人的脑海之后，对宋朝日后试图培养一流的将领，组织一流的军队自然会产生极大的阻力。宋朝早期少见的良将范仲淹就指陈过这种政策的缺失：

会王伦寇淮南，州县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诛之。仲淹曰：“平时讳言武备，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诛。^②

当时的宋廷平时不讲究武备，遇有动乱却希望各地官员都能摇身一变成为能征善战的将领，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难怪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历史中，宋廷必须以金钱布匹来购买和平，而最后还是灭于金人之手，南宋（1127—1276）就更不必提了，苟延残喘了一个多世纪，最后终于被蒙古灭亡。

提倡人文教育自然有其正面的效果，比如宋朝的士风振奋，官学及私人书院兴盛，规模宏伟的丛书相继出现，印刷事业发达，科技进步，先后发明印刷术及火药等等。但是因重文而轻武，宋朝的社会普遍缺乏雄壮英武的气息。如同十九世纪受了中国思想影响的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他



① 方豪《宋史》，页64。

② 《宋史·兵七》，册29，卷314，页10272。

的〈论说与答覆 (Expostulation and Reply)〉一诗中所描写的威廉 (William) 一般，宋代很多读书人——包括苏轼和他弟弟苏辙——常喜欢静坐不动：“终日危坐，一语不妄发。”^① 更糟糕的是不少士大夫喜欢蓄妓，追求奢侈玩乐的生活。当时的名词人张先 (990—1078) 年纪到了八十五岁，还在寻妾。苏轼就是在这种畸形的社会中诞生的。

① 《宋史·儒林列传·蔡幼学》，册 37，卷 434，页 12899；参看《宋史·张载》，册 36，卷 427，页 12724；《宋史·邵雍》，册 36，卷 427，页 12727；《宋史·杨时》，册 36，卷 428，页 12738；《宋史·陈渊》，册 36，卷 428，页 12744；《宋史·李侗》，册 36，卷 428，页 12746；《宋史·种放》，册 38，卷 457，页 13422；《宋史·杜生》，册 38，卷 458，页 13453；《宋史·徐中行》，册 38，卷 459，页 13457；《宋史·苏云卿》，册 38，卷 459，页 13459。